



周振华 张学良 主编

大转型时代的中国城市化：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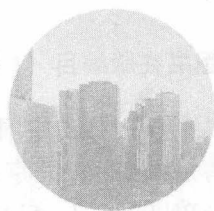
ZHONGGUO

DAZHUANXING SHIDAI DE ZHONGGUO CHENGSHIHUA
CONGNALILAI DAONALIJU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上海中青年区域经济学家论坛第二辑



周振华 张学良 主编

大转型时代的中国城市化：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DAZHUANXING SHIDAI DE ZHONGGUO CHENGSHIHUA
CONGNALILAI DAONALIKU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转型时代的中国城市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周振华，
张学良主编.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 -7 -5141 -4278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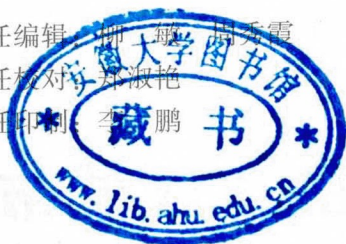
I. ①大… II. ①周…②张… III. ①城市化 - 研究 - 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1469 号

责任编辑：周敏 周雪霞

责任校对：李淑艳

责任印制：李鹏



大转型时代的中国城市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周振华 张学良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辑部电话：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汉德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华玉装订厂装订

710 × 1000 16 开 12.25 印张 200000 字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5141 -4278 -5 定价：3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讲

中国城市化：三个视点的散论与综合	1
一、问题的提出	2
二、城市化：三个经济学分支视点及其缺失	3
三、城市化：一个劳动者自选择理论视野	7
四、中国城市化：一个经济全球化视野	10
五、中国城市化：一个“泛”核心—外围视野	12
六、中国城市化：一个综合视野	15

第二讲

中国城市化的内生机制及其深层挑战	20
一、怎样观察中国城市化	20
二、中国城市化的十大悖论	22
三、简短的结语	41

第三讲

中国城镇化发展陷阱：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49
一、为什么要关注城镇化	50
二、老问题新故事：农村空心化与消逝	51
三、城镇化与城市化：政府还是市场	54
四、转户与土地农转非运动：被误读的市民化	60
五、土地与户籍制度：优势与未来挑战	66
六、回答如何破题城镇化建设运动	72

第四讲

土地财政、土地金融与可持续城市化模式	78
一、中国当前城市化发展阶段与主要矛盾	78
二、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	82
三、未来 10 年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制度与城市化 融资体制改革	93

第五讲

城市化与工业化及其服务经济发展	99
一、在更大的背景下考察我国城市化滞后问题	100
二、工业化挤占城市化对服务经济发展的抑制效应	103
三、发展转型与新型城市化	106

第六讲

城市不死：全球视角中的中、美城市发展	109
一、三个误解	110
二、城市和区域发展的 3D 和 3M	114
三、美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	124
四、中国城市发展的过去与未来	129

第七讲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 2030 年城市化目标	139
一、引言	139
二、挑战在哪里	140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加速推进城市化的必要性	144
四、2030 年城市化率达到 80% 的可行性	149
五、小结：2030 年的中国	153

第八讲

中国的城镇化战略与城市群的形成	156
一、城镇化与城镇化战略	157
二、实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意义	158
三、农民工：中国城镇化的主体	161
四、城市与城镇：城镇化的载体	163
五、城市群：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165

第九讲

关于中国城市研究的几点思考：研究误区、研究方向 与研究平台	170
一、城市发展存在问题	171
二、城市研究存在问题	173
三、城市诊断研究	176
四、城市诊断决策咨询系统	179

后记	186
----------	-----

第一讲

中国城市化：三个视点的 散论与综合

时间：2013年4月25日上午9:30~12:00

地点：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403会议室

演讲嘉宾：

赵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浙大 CRPE 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诺丁汉大学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GEP) 主任。1982 年兰州大学研究生毕业并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1993 年两度赴英国，先后在剑桥、曼彻斯特等大学进修。1997 年迄今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日本神户大学、日本经贸产业研究所 (RIETI) 等国外名校客座教授，兼任浙江省委政研室、省政府咨询委等政府“智库”专家及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等学术团体职务。研究兴趣涵盖国际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及外国经济史等领域。迄今在 *Journal of World Trade*、《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中、英文论文 200 多篇，学术随笔百余篇。著（编）有《干预市场》等著作 15 部。主持并完成国家及省部级各类研究项目 20 多项。2010 年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特别学术贡献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一、问题的提出

空间经济学是我最近几年在做的方向。为什么做空间经济学呢？这可谓偶然性中的必然，用空间经济学专业术语说是个“知识外溢”的结果。如果看我的领域，早期读研读的是外国经济史。我1980年考研，那时专业上没法选择，只有“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和经济史等专业。我选择了“外国经济史”，原本想摆脱“资本论”，淡化政治经济学。毕业之后我出国留学主要搞国际经济学，回国在几个大学搞的主业也是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一个多半有点偶然的因素，结识了在日本立命馆大学做教授的杭州人郑小平先生，交往多了，他和他们的学部长平田纯一教授联名邀我去立命馆大学做客座教授，请我给那里的海外学生用英文讲课。我开了两门课：一门是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一门是Chinese Economy。期间郑先生介绍我去京都大学藤田昌久任职的经济研究所做一场学术报告。藤田昌久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名气很大，要到他那儿做报告，是有一定压力的。为此我有意识地做了下“功课”，把他的研究成果重点翻了翻。他搞的主要是地域经济学，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与方法。那两年我也在做这方面研究，虽然我主要搞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但在中国做什么都离不开地区问题。浙江的“走出去”战略课题最早是我做的，区域经济“二重开放”概念是我最先提出的，区域经济现实我很熟悉。不仅浙江，而且别的关联地区。因为做浙江经济一定要放在长三角框架下，和长三角别的地区比较。做长三角经济得和珠三角及环渤海地区比较。我按照理论与中国现实比照的思路，写了一篇英文文章。就是从研究空间和区域经济的两个分支学科在中国的“混搭”提出问题：一个是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NEG），另一个是区域一体化经济学（Economic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RI）。一体化经济学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的的一个分支，主要解释国与国之间经济整合，是个有“国家无区域”的框架，关键词是“一体化”；新经济地理学带有微观经济学特征，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如产业集聚现象等微观机理，是个“有区域无国家”的框架，关键词是“集聚”。两个分支是有严格区分的。但在中国情景下，这两个分支经常给“混搭”在一

起。尤其是一体化的滥用，比如说江、浙、沪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两个临近省域经济的一体化等。懂点这方面理论的人听了觉着有些别扭，怎么中国内部还有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类似问题？我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体化与集聚：中国情境下的可能整合》。发给藤田昌久教授，他看了之后来电说挺喜欢，然后就邀我去京大做了场报告。由此与藤田先生结识。后来有来有往，交往多了，这样我也就接受了一种“知识外溢”，从藤田昌久和他的学术朋友们那里接受了许多空间经济学思想与方法。我相信他也接受了我的一些知识外溢，比如关于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有些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影子，我们叫“地方保护主义”。

今天我报告的主题是城市化，城市其实也是空间的问题。前两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工业化与城市化：中国沿海三大区域模式及其演化机理”（赵伟，2010）。那篇文章从经济史、经济理论以及中国现实三方面知识结合讲了一种思路，提出沿海工业化的三个区域模式及其特征。这次想捡起这个话题。这里列的只是一个框架，按照这个框架讲下去，希望讲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新思路。

二、城市化：三个经济学分支视点及其缺失

城市化是一个多学科聚焦的对象，但是哪一个学科对于三个问题都是难以回避的，三个问题姑且用英文三个W表示：第一个W即What，什么是城市化？先得有个定义，各个学科回答不一样。第二个W是How，城市化是怎样推进的？这引出城市化的路径模式问题。第三个W即Why，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城市化，驱动因素（driving forces）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

我先归纳一下非经济学科对What的回答。首先是城市学，它把城市化界定为两个进程：一个是人口乡村而城市的移动；另一个是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就是人口由乡村而城市向的移动和人们生活生活方式由乡村变为城市两个过程的合一。人口统计学把城市化界定为人口空间集聚的一种过程。结构主义则将城市化界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结构上的变化，主线是“非农化”，那以前经济活动主要是农牧业，后来是非农业，包括二产化、三产化或者所谓“服务业化”等结构变化。行为主义者撇开人口地域组

合，强调人们生活行为的变化。城市居民的生活行为和乡村不一样，连走路都得按照警察画的线路走。历史学把城市化看成文明演化的形式和结果，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 1950）就持这种观点，他的书影响了好几代学者，他把城市演化等同于文明进程。这些，是非经济学学科对城市化的界定。

那么经济学对于城市化是怎么定义的呢？经济学直击城市化论题的分支学科有三个：第一个是韦伯所开拓的工业区位理论。按照工业区位理论，可将城市化视为非农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结果。因为在韦伯眼里，近现代城市不过是工业区位选择的结果，先有工业选择，后有现代城市；第二个是城市/地域经济学，这个就宽泛了，大部分研究者实际上将城市化视为经济活动空间结构变化的过程与结果；第三个是新经济地理学，把城市化视为集聚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用得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是“空间集聚”（spatial agglomeration），任何经济活动都倾向于空间上集聚，企业和人都有扎堆而居的倾向，分享“空间外部性”。从这个视野也可对城市化进行界定。

关于第二个 W（why）即为什么会有城市化，经济学各个分支给出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便是效率寻求。说清楚点就是把城市化的首要驱动因素（Driving force）视为效率寻求（efficiency seeking）。城市的生产率比农村高，也就是资源配置效率高，这是所有关于城市化的经济学视点的一个一致的切入点。进一步看，还有空间外部性（spatial externalities）。当代空间经济学鉴别出的外部性有三种，分别为 MAR（马歇尔-阿罗-罗默）外部性、雅各布斯（Jacobs）外部性，以及波特（Porter）外部性。三种外部性都是集聚和城市化的结果，尤其是雅各布斯外部性，本身就是以城市化那种集聚方式切入审视外部性的。

沿着效率寻求，经济学三个分支学科测度城市化效率用得最多的指标，无非是 TFP（全要素生产率）、要素的边际收益率等指标。具体说就是劳动工资如何？资本的收益怎样？土地的收益怎样？如此等等。一般情形，大城市、同一城市的中心区要素的收益就高。故而可以认为，经济学各分支把城市化的动因归为效率寻求，没有效率的城市一定会消亡的，历史上解体了的城市，一定是那些失去了效率的城市。

经济学关于第三个 W 即 how 的答案是多样的。具体到上述三个分支学科，虽然关于城市化的动因视点一致，都强调效率，但围绕怎样去搞城

市化之类问题的答案则明显不一，有些方面分歧甚至很大。分歧多半源自对城市化选择主体的认定上。所谓选择主体，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谁来选择？是政府，是企业，还是个人？究竟应该首先遵从哪个主体的意愿？是遵从政府意愿？政府先规划个城市，设立企业、商城和居民住宅去，每家分一个居所，形成城市，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流行做法。苏联做得最夸张，后为中国跟进。或者是尊重个人选择？有人愿意去纽约、去波士顿或费城甚至洛杉矶，还有人就愿意居住在乡下当农民，这是他的选择，政府无权干预。这在美国可行，在中国以前不可行，目前的可行性在增加。

三个经济学分支学科强调城市化选择主体不一：工业区位理论强调工业家的选择。沿着韦伯的视野看，那些想制造某种产品的人会选择好的区位。城市与地域经济学方面有研究强调政府主宰与规划，有些政府与规划“万能”的倾向。但在中国“鄂尔多斯”现象——房地产泡沫破裂变“鬼城”发生后，需要重新认识政府与规划主宰的做法。空间经济学之 NEG（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个人选择。NEG 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种意境：尊重个人意愿，让个人选择，结果一定是好的。具体到城市化，有些人特想住到上海，有些人还特想住到西藏或内蒙古呢。自己选择去西藏或内蒙古的人他不会抱怨，一定认识到在西藏或内蒙古他的价值要大于在上海。像计划经济时期把上海“知青”发配到新疆或内蒙古，违背个人意愿，效率不会太高的。NEG 强调的个人选择，还包含了与人联系在一起的非劳动要素流动，主要是资本要素。因此选择是要素所有者的个人选择。这给 D-S 模型（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刻画得很形象。D-S 模型蕴含着这样一种意境：一单位劳动同时包含了一单位资本以及一单位的消费，劳动、资本与消费者效用“三位一体”。这种集聚实际上是基于个人选择。这样去看企业选择，你得顺应个人偏好或意愿，企业家可以决定把企业办到什么地方，这是他的意愿，但他在做这个决策时，首先得考虑能否招到他所需要的人手？后者则是个人选择问题。

进一步看下去，经济学三个学分支关于城市化选择主体，多半缺了两个“特定”的“外生变量”，分别为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合起来就是“特定的时空”。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城市化，都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发生与演化的，这一点不言而喻。同样不言而喻的是，考虑到特定的时空，18 世纪到 19 世纪初期的英国城市化和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叶的北美及欧陆的城市化不一，甚至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不同时间的城市化

演进模式也不一。

考虑到这两个特定的因素及其结合的寓意，可以这样去看，同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城市化选择主体，究竟是政府占优、企业占优，还是个人占优，因时而异。此一时也彼一时，不同时代截然不同。封建时代、计划经济时代一定是统治者和政府选择，无视个人意愿。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和那些时代不同。就是说，讨论选择主体得考虑时间维度，还有空间维度，这里说的是空间范围大小。中国绝大多数人以前的空间视野，多半不超出其生活的那个村子周边5公里范围，他一生的梦想也就是进县城做个县城居民。后来人们可以外出打工、自由迁徙，活动空间范围大了，他的梦想也许是进省城或“铁岭”之类的大城市，再后来是北京或上海，但怎么也跑不出中国的。然而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也就是“90后”一代人立业成家的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空间视野与活动范围骤然扩大了，超过了以前所有时代。“90后”一代人的空间就是全世界！因为他们这一代普通人坐飞机出国也成了家常便饭，世界变小了，空间变小了。

所以我一直在考虑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变化对一个人、对一个地区甚至对一个国家发展的意义，可谓影响太重要了。我们每个人对于我们所处的时间维度是没法改变的，但是空间维度是可以改变的，空间改变意味着现在接触的人和物与以前不一样了。很多人空间改变就成功了，不改变死路一条。用经济学的视点看，空间改变可以提高效率，何乐而不为？但是效率提高究竟是谁发现的，是政府，是企业，还是个人？谁对单个个人的价值最关心？这样看下去，迄今关于城市化的理论视点是有缺失的，迄今的理论多半未曾给特定时间及特定空间维度以足够的考虑。因此需要引入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来重新审视城市化。

简而言之，我的目的，就是试图引入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维度来审视中国城市化，尤其是城市化主体和政府政策着力点等问题。时间维度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最大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空间维度就是中国城市化必须面对的迅速扩大着的空间范围。接下去，这种变化对城市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改变了哪些约束条件？进而，约束条件的改变对城市化选择主体的意义，是增加了个人选择余地还是政府与企业的主宰与主导地位？最后，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政策，旨在于打造一流城市或增加城市效率的政府，究竟应将着力点放在哪儿？是遵从个人选择意愿因而增加个人选择空间，还是强化别的主体的强势？

三、城市化：一个劳动者自选择理论视野

先从理论说起。我向来认为，做任何专业工作，三方面知识缺一不可：一个是理论，没有理论你看不到现象后面的东西和联系；二是历史，没有历史知识你无法形成动态视点；三是现实观察能力。搞学术研究更是不能缺少理论。先从理论说起。

理论先从空间经济学说起。前已论及，空间经济学强调个人选择，个人既是要素所有者、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或曰效用的追求者，是个“三位一体”的概念。这里先撇开早先 NEG 经典模型即 D-S 模型引出的“核心—外围”模型，直接从最新研究文献说起。新文献层出不穷，但和我们主题很相近且很有启示的理论，当首推维纳布尔斯（Venables, 2011）提出的理论模型，叫做“劳动者空间自选择与城市分层”。

先介绍他的理论模型。和任何经济理论一样，模型从假定开始，假定：

——全部个人分为两类，分别为高技能的 H 和低技能的 L；全部城市分为两类，分别为生活费昂贵的城市 1 和生活费低廉的城市 2；劳动者在各自选择的城市中随机搭配。

——匹配与产出：两名高技能工人 HH 搭配，产出为 $2q_{HH}$ ；两名低技能工人 LL 搭配，产出为 $2q_{LL}$ ；一名高技能工人 H 搭配一名低技能工人 L，产出 $2q_{HL}$ 。

—— $q_{HH} - q_{HL} > q_{HL} - q_{LL}$ 。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哪类工人住在哪座城市？比如你选择住在上海还是江苏无锡？上海房子贵，物价也贵，生活成本高，因此是这里假定的城市 1。无锡房价、服务价格以及生活成本都要小许多，因此是这里假定的城市 2。

遵从前述假定，一般的情形是可以推断的：高技能工人 H 倾向于选择上海。因为上海高技能的人才占总量的比重较高，找到同样技能或水平相当的合作的概率较高。而高技能工人彼此都存在近乎相当的“知识外溢”，相互学习知识收益大，故而两名 HH 搭配的产出高，足以弥补城市 1 较为昂贵的生活成本，甚至还可能有剩余。

再假定： H 为该地区所拥有的高技能工人总数， θ_H 为城市 1 吸引到的 H 类工人的参数； L 为低技能工人总数， θ_L 为城市 1 吸引到的 L 类工人参数。假定工人代表城市人口，那么我们来查看各个城市的人口：

第一个城市 $N_1 = H\theta_H + L\theta_L$ ；第二个城市 $N_2 = H(1 - \theta_H) + L(1 - \theta_L)$ 。然后看高技能工人在各城市的比率：

$$\mu^1 = H\theta_H / (H\theta_H + L\theta_L)；$$

$$\mu^2 = H(1 - \theta_H) / (H(1 - \theta_H) + L(1 - \theta_L))。$$

按照上述假定及变量间的关系推断，一个城市集聚的高技能人才越多，这个城市的生产率就越高，城市向心力就越大。反之则低。

再看两类工人住在城市 i 的价值：高技能工人的价值是：

$$V_H^i = q_{HH}\mu^i + q_{HL}(1 - \mu^i)。$$

低技能工人的价值是：

$$V_L^i = q_{HL}\mu^i + q_{LL}(1 - \mu^i)。$$

打个比方，在上海，高技能的人数众多，高技能人才之间匹配的概率就高，因此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高。问题是，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城市？这里假定的两类技能不同的人在两个不同城市的分布怎样决定？维纳布尔斯（Venables, 2011）认为是由城市生活成本决定的。说具体点就是特定城市劳动者产出与其在那座城市的生活费用（成本）之间的权衡决定的。他的推断是这样的：

假设城市 1 以 c 表示的生活费更高，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人们会选择住在城市 1 居住：

$$\text{之一： } V_{1H} - V_{2H} = (q_{HH} - q_{HL})(\mu^1 - \mu^2) + \geq c$$

$$\text{之二： } V_{1H} - V_{2H} = (q_{HL} - q_{LL})(\mu^1 - \mu^2) + \geq c$$

这里等号左面的差实际上就是同一类工人即高技能工人住在两类城市自身价值的差异。等号右面的表示高技能工人在两类城市搭配差异。其中在第一个条件中，存在 HH 搭配的可能，第二个条件中，仅存在 HL 搭配的可能。按照前面的推断，第一个条件代表城市 1，第二个条件代表城市 2。这样不难看到城市随 H 多寡而分层。 H 比率越高，对于 H 引力越大，该城市产出就越高。

维纳布尔斯用了两张图描述两个城市两类工人因而人口分配的均衡。其推断结论是，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和生活费用的上涨，高技能人才倾向于迁入城市 1，低技能工人倾向于迁入城市 2 到一定程度，城市 1 吸引了全

部高技能工人和一部分低技能工人，城市 2 吸引到的全部是低技能工人。但也会有物极必反的“拐点”，当城市 1 的生活成本过高时，连高技能工人也会逃离，迁往城市 2（见附录图 1 与图 2）。

上面是 NEG 最新理论，现在结合我们中国的城市化现实，来看看理论的妙用。

维纳布尔斯这个理论的寓意何在？最重要的寓意是，生产率 - 生活成本差异刺激着技能有别的个人集聚于不同的城市，并导致城市分层，将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技能者比率较高因而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另一类是低技能者比率较高因而生产率较低的城市。

从劳动者技能差异到城市差异之间的关联来看，这实际上是个异质性传递与放大的过程。先是劳动者技能异质性，这个异质性引出劳动者匹配的异质性，后者引出生产率异质性，进而引出城市异质性。沿着这个思路可朝着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向拓展。

现实世界的劳动者技能并非分为两个层次，而可分为多个层次。可以这样推断：无论 H 还是 L，都可细分出几个层次。假定 H 分出三个层次，即 H1、H2 和 H3。L 分出两个层次，即 L1 和 L2。沿着同样的逻辑可将城市分出五个层次，城市生产率也相应形成五个阶梯。套用中国城市可以这样去设想：北京、上海属于“一级城市”，那里集聚的 H1 最多；广州、杭州、南京等沿海城市属于二级城市，那里集聚的 H2 最多；武汉、成都、西安等内陆城市属于三级城市，那里集聚的 H3 最多；别的中西部省会城市属于第四级，集聚的 L1 最多；其余城市属于第五级，集聚的 L2 最多。这样城市分为多个层次。这种分层对于城市化现实意义是，每个城市规划都得考虑你这个城市的定位问题。是吸引顶级人才 H1 还是别的级别的人才？

进一步地看，这个理论暗含了一个前提：个人具有充分的空间选择自由。现实世界则不然。现实世界的情形是，个人在选择工作与居住地方面受多种因素制约。不同技能的人空间选择自由度不一，选择范围不一。一般而言，低端劳动力选择余地最小，越是高端人才选择自由度越大。这意味着城市化得考虑用什么条件去吸引什么样技能的人才。

还可以这样推断，顶尖的高技能人才对于一个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呈几何级的。如果一个顶尖高技能的人才从一个城市迁走，他所能影响的就业要比别的高技能人才多得多。比如阿里巴巴的创始人、苹果、三星等

高端人才，他们迁移到那儿，多半都会在那里折腾出一个不错的行业，解决许多人的就业的。如此等等。当然这类人影响的就不仅仅是就业，还有城市 GDP。这个在中国城市竞争中很重要。

按照这个视野看下去便不难推断，中国城市化的城市定位应是多样的，不仅应打造一些对于高端人才具有吸引力的城市，而且还应建设一批能使普通劳动者安居乐业的城市。尊重或着眼于个人意愿，扩大个人选择范围，增加个人迁徙自由，当是城市化进程中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乃至基本着力点。

四、中国城市化：一个经济全球化视野

上述推理主要基于理论。光有理论还不行，还得考虑中国现实情境，首当其冲的现实是我们的城市化所处的时代背景。这样就转到另一个问题上，即时间或时代与个人选择的自由度。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就经济人活动空间范围来看，是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个全球化的新阶段。全球化是国与国之间不断强化的经济整合，这是一般的界定。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就是中国城市化掀起高潮的这个时代，全球化都有哪些特点，发展大势何在？这些发展对于我们的生活将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的城市化将意味着什么？

这方面有两部文献值得一读：一部是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 2007)写的《世界是平的》，副标题是“21世纪简史”。这是本基于现实观察的非学术著作。另一部是瑞士日内瓦研究生院理查德·鲍德温(R. Baldwin, 2011)的文章，标题是《全球化第二次非捆绑化之后的贸易和工业化：怎样建设及参与供应链意义不同，何以重要?》(Trade and industrialisation after globalisation's 2nd unbundling: how building and joining a supply chain are different and why it matters)。两部文献的视角相近，但观点不同。弗里德曼按照电脑软件分法把全球化分为三个“版本”(Version)，实际上是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他所说的V. 1. 0，从1492年到19世纪。很清楚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英国工业革命。认为这个阶段的全球化主宰力量有三个，分别为国家的实力、军事强权尤其是海军的实力以及“帝国主义”。其中最后一个是一种理念，什

么理念？就是霸权理念，我说了算的那种理念。第二个阶段即他所说的全球化 2.0 版，自 19 世纪到 2000 年，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1760 年）到 20 世纪结束。全球化的主宰力量是跨国公司和大企业。故而哪个国家有称雄世界的跨国公司和巨型企业，那个国家在全球化中就占有先机。相对前一个阶段，军事实力不重要了，蛮不讲理的霸权和帝国主义理念越来越难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到了 20 世纪后半期尤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范围内的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越来越讲规则。第三个阶段即他所说的全球化 3.0 版。时间上自 2000 年开始，目前还在推进。

这个阶段全球化的主要动因是互联宽带网为纽带的各种创新。包括个人电脑、电子商务、外包（outsourcing）和无所不能的离岸（offshoring）。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由于这类创新，世界“被碾平了”^①。这个阶段，大企业的优势在丧失，小企业优势迅速提升。国际分工由产业、行业与最终产品细化到产品部件及工序层面。一个全球性的以互联网为纽带的竞争合作平台得以形成，由于这个平台，各种信息与金融资产以光速在流动，小企业乃至个人都可参与全球分工。由于这个平台，个人想法很容易变成产品，小企业很容易变成大公司。这方面最引人瞩目的例子，还是乔布斯的苹果。iPad、iPhone 等当初也就是一种想法，经过设计变为蓝图，通过各种“外包”开发出或者买来各种技术，最后通过“外包”制造出来。仔细想想，如果没有互联网、外包和电子商务，谁能在短短几年时间把一家小公司做成市值世界第一？

可以这样看，在这个 3.0 版的全球化时代，由于有了互联网，距离不再重要，一个人即便是在偏远的西藏，他要有个好的 idea，只要能上网，在网上发布，一夜之间全世界都会知道。假定是个很好的专利，就会有“风投”行家看到，有人愿意投资，接着就会有设计及研发机构愿意合作，还有人愿意代理销售，如此等等，很快就会弄出一个世界级的产品和企业。进而通过外包、上市与离岸经营等操作，在不太长时间内就变为市值很大的公司。另一方面，一些巨型公司，由于管理不善或别的原因，像大树那样失去创新与生命力，一个纰漏或质量丑闻，一昼夜全世界都会知道，会轰然倒下的。

理查德·鲍德温在这方面也写了好几篇文章，提出一个“新的非捆绑化阶段”说（new unbundling stage）。他也将经济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

① 他列举了“碾平世界的”十个因素（ten flatteners），此处仅选择其中的经济与技术因素。